



中国当代教育学术文库

教育学研究的价值生成

李润洲 著

教育学研究的价值生成不仅受制于其价值立场的选择与定位，而且取决于教育问题的选择、研究路径的取用及学术评价的导引。在教育问题的选择上，增强问题意识是提升教育学研究价值的起点，而问题意识的增强不仅要明确学术追求、守住学术良知、坚守价值立场、培育教育学思维，而且要增强实践关怀、确立实践立场、加强学术交流、树立对话意识。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ZHONGGUO DANGDAI JIAOYU XUESHU WENKU

中国当代教育学术文库



教育学研究的价值生成

李润洲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教育学研究的价值生成/李润洲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0. 6
(中国当代教育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440 - 4289 - 5

I. ①教… II. ①李… III. ①教育学 - 价值论 IV. ①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3260 号

教育学研究的价值生成

责任编辑 樊爱香

复 审 张沛泓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4289 - 5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 - 4120948

中国当代教育学术文库

学术委员会

顾 问：叶 澜 汪永铨 沈德立 黄 济 鲁 洁

主 任：顾明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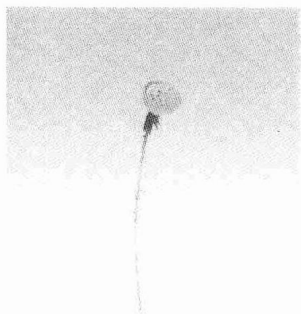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邦平 丁 钢 石中英 刘海峰 陈学飞

吴康宁 柳海民 荆作栋 涂艳国 靳玉乐

办公室

主 任：樊爱香（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教育学术文库》总序

靳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了给教育学科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搭建一个学术平台，我曾经为山西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中青年学者教育学术文库”。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聘请我和汪永铨教授、鲁洁教授等组成学术委员会。我们每年对中青年学者申请的学术著作进行认真的评审，选出最优秀的著作出版，先后出版了二十多部。这套文库中的许多作品都获得各种奖励，例如项贤明的《泛教育论》、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丁邦平的《国际科学教育导论》都是全国头三批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檀传宝的《德育美学观》曾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因此这套文库的出版在中青年学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山西教育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几部老年学者的著作，如黄济教授的《教育哲学通论》、我的《中国教育文化基础》等。但是，由于出版社的改制和调整，“文库”有所停顿。

近年，出版社新的领导决定要把“文库”继续办下去，以繁荣我国的教育科学。经过多名学者的座谈研究，基于过去出版的教育学术著作已经不限于中青年学者的作品，所以把原来“文库”的名称改为“中国当代教育学术文库”，重新组织编辑委员会。新的“文库”除了吸收近年来的新作品以外，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作品重新排印，归纳到新的“文

库”中来，形成反映我国当代教育科学研究新成果的系列丛书。

我们刚刚庆祝过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科学繁荣昌盛，学术研究成果累累。如何把这些成果呈现出来并加以传播和应用，出版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新的“文库”的出版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前，我国教育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现在起到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大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为此，中央制定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今后十年的教育发展制定了蓝图。要认真落实“规划纲要”，需要认真学习、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大胆试验。在落实过程中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学术界去研究和探索，教育科学必将迎来新的繁荣。新的“文库”的问世适逢其时，它将为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服务，为我国教育科学的繁荣服务，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搭建呈现成果的平台。

特别可喜的是，十多年来我国教育科学界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于“文库”的出版抱有很高的热情和期望，而山西教育出版社对于“文库”一直是热忱支持。承蒙他们对我的信任，还要我参加此项事业。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事业，让我们大家来爱护它、发展她。

看到李润洲博士的著作《教育学的价值生成》，不禁想起了十五年前自己从事教育学博士学习时写的学位论文《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它们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想回答教育学研究工作如何实现其价值承诺并赢得学术界内外认同和尊重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联之处在于：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当年我的研究的一个继续或深入。当年我在思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时提出“教育学的文化性格”这个观念，把教育学的根本性质理解为文化科学或价值科学；本书则努力地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致力于思考教育学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较为充分地实现教育学的价值问题。

说实话，当年他选择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我的内心并不是很赞同。当时我主要的考虑是不想让他犯我当年犯的同样“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作为一名教育研究经验还不够丰富、教育学科的修养还不够好的教育研究新手，思考这样的学科基本问题毕竟缺乏深厚的功力。如果是一个在该门学科领域内已经有大量研究的学者再回过头来思考本学科的基本问题，可能更加合适，也更加有资格。所以当时我委婉地提醒他可以研究一些当前教育实践中比较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但是，他是一个态度上很诚恳、行为上也很执着的人，一心想在自己所选定的问题上走下去。我猜想，他的执着的甚至有些固执的心态也许正如我当年：一方面是解决自己内心的困惑与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教育学科及其研究的无限热爱和自觉责任。

他较好地完成了自己预定的研究任务，对“教育学的价值生成”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他思考的这些问题，我国教育

学界也有许多同行们都思考过。难能可贵的是，他一方面努力地吸取同行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也能够独立地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清晰而系统。他提出，教育学的价值是指研究主体意欲达成而创造的、能够满足研究者和其他主体需要的存在。有价值的教育研究应具有学术性、创新性、伦理性与实践性，这些特性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也有互相对立的一面。在意识形态与教育学的关系上，他认为，意识形态与教育研究是一种共存关系，教育研究与其虚幻地“去意识形态化”，毋宁现实地处理好学术与政治、述学与咨政的关系。在异域教育理论与我国教育学的关系上，他认为异域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教育的实践问题，中国教育学界应确立起主体意识。在其他学科知识与教育学的关系维度上，他提出教育学要对“人何以为人、教育何以为教育”等原点问题拥有教育学的理解；要综合运用概念思维和“象”思维，要密切关注社会发展，积极参与教育变革。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上，他主张二者应保持必要的张力，教育理论要想恰当地表征教育实践，需要从观念叙述、实体叙述、宏大叙述及单一本质叙述转变为现实叙述、关系叙述、事件叙述及多元本质叙述。该著作还从教育问题的选择、研究路径的取用及学术评价的导引等环节讨论了教育研究价值实现的问题，其潜在地假定是：知道教育学有何价值还不够，研究者还需要在具体的教育研究过程中注意去实现这些价值，以提升教育研究的水平。这些学术主张，能够给感兴趣的读者带来一定的启发，并值得进一步地讨论。

可以相信，教育学界有关教育学自身问题的讨论会伴随着教育学史的不断展开而继续下去，它也许是每一个教育学者一生的研究生涯中早晚要讨论的问题。二十多年教育学学习和研究的经验表明，对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尽管不能等同于对教育具体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但是大量的、丰富的教育具体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反过来也会启迪我们对于学科自身的新理解。我真诚地希望李润洲博士在完成本书之后能够及时地投入到大量的、紧迫的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去，在丰富的教育实践问题研究过程中继续思考我国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为我国教育学事业的发展和日益广阔的教育改革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石中英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1

导 言 教育学的价值危机 /1

- 第一节 教育研究价值危机透析 1
- 第二节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10

第一章 教育学的价值向度 /20

- 第一节 教育研究价值的界定 21
- 第二节 教育学的价值维度 29
- 第三节 教育学的价值矛盾 37

第二章 教育学的价值立场 /45

- 第一节 共存与博弈：意识形态与教育研究 46
- 第二节 学习与中国化：异域教育理论与教育研究 65
- 第三节 借鉴与原创：其他学科知识与教育研究 84
- 第四节 张力与表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107



第三章 教育学的价值生成 /131

第一节 增强问题意识，提升教育学的价值 132

第二节 洞察研究路径，保障教育学的价值 152

第三节 辨识评价理念，呵护教育学的价值 181

结 语 教育研究价值生成的剪影 /209

参考文献 /216

后 记 /229

导言

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危机

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学研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无论是教育基本理论，还是教育分支学科；无论是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还是教育学研究的实践介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价值也日益凸显出来。应该说，时下，中国教育学研究百花争艳、百舸争流，正处于教育学研究蓬勃发展时期，即使说教育学研究正渐入“春天”佳境也不过分。那么，此时谈论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危机岂不有杞人忧天、不合时宜之嫌。可是，再往深处想，居安思危，乃是做人为学的基本道理。试想，当教育学研究被置于边缘，无显山露水之机遇，惨淡经营聊以度日，又何危机之有？同时，“危机”不仅意味着挑战，而且也意味着机遇。因此，正视、直面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危机，并非自暴自弃、自我作践，相反，是“爱之深，恨之切”，是希冀教育学研究少走些弯路，更充分地体现其价值。

第一节 教育学研究价值危机透析

谈论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危机，自然要明确所谈论的教育学研究是什么，它与通常所言的教育研究有何区别。

一、教育学研究的厘定

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学在从“教学之学”衍变为“教育之学”的过程中，其研究的触角愈伸愈广，原先那种囊括教育研究领域所有知识的



“大教育学”，日益不堪重负，于是，随着教育学的发展，教育学的各分支、交叉学科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就教育学来说，教育论、教学论与德育论等经典的教育学构件已脱离母体而独立，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交叉学科也挺立在大“教育学”面前。“教育学”似乎被掏空而仅仅留下一个名称，而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大教育学”作为教育学存在的早期形态，也符合学科发展的历史规律。比如，数学、物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都曾是涵括某一研究领域所有知识的大学科，现在，大数学、大物理学、大经济学与大社会学都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生机勃勃的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但数学、物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地位、声誉并没有多少人去怀疑。这里用教育学研究而不用教育研究，一方面意味着即使大教育学不存在了，但大教育学所形塑的学术传统是存在的；另一方面意味着此处的教育学研究更多的是指教育理论研究。

一般而言，许多学者对教育研究与教育学研究并没有进行刻意的区分，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教育学“学科情结”的外国学者而言，他们所指的教育研究就是指科学研究在教育中的运用，“是一种系统的调查、探究，包括资料的收集、教育问题的解决和对教育理论、实践的贡献”^①。在教育成为大众话题的今天，对教育研究进行狭义和广义的区分也有必要。“广义的教育研究是人们在教育实践中对教育现象的观察、思考，对教育问题的尝试性解答。狭义的教育研究即教育学研究，一般要求有明确的研究目的，特定的研究对象，严密的概念、范畴和体系，多样互补的研究方法，并能完成教育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两大任务。”^②由此可见，教育学研究是指站在“教育学的学科立场”上对教育进行的理性探究，它不仅建构教育理论，而且希望通过教育理论完善教育实践，比那种广义的教育研究要求更严格。但问题是教育学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领域，其学科立场到底是什么，这些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里暂不深究。不过，不管教育学是一门学

① James H. McMillan, Jon F. Wergin.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WordCrafters Editorial Services, Inc, 1998.

② 孙俊三：《教育研究的境界——论教育学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的追求》，载《教育研究》2005年第11期。

科，还是一个领域，其学科立场究竟如何体现，但从研究主体来看，教育学研究也可以看作受过专业训练，在大学和研究院（所）工作的专职或兼职研究者所从事的一种研究活动。因此，这里所说的教育学研究既指站在“教育学的学科立场”上进行的研究，也指工作在大学和研究院（所）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所从事的研究。^①

二、教育学研究价值危机的“症候”

一位教师的心声：

这些年专家报告听了不少，细细回顾，最愿意听有理论、有实践的专家报告，而不愿意听“纯理论家”的报告。比如，听李镇西的报告，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爱”。他用自己的教育实践诠释了教育的真爱，并通过培训的方式将这种感觉和行为传递给我，李镇西丰富的教育实践让我觉得“教育之爱”特别具体。魏书生的报告在轻松幽默中给人以教育的智慧，他能用自己的智慧启迪我的教育思路，并用他的教育实践向老师们传授了许许多多有用、有效的教育方法，能立即指导教师的教育行为发生质变，并且能举一反三地开拓教师的教育思路，所以我喜欢。而“理论家”的报告，虽然理论高深，从国外到国内，从前沿到超前沿，无休无止，高谈阔论。但很遗憾，多数老师没有听懂，于是没有了兴趣，培训现场的空位率越来越高，这与李镇西、魏书生的报告现场座无虚席反差极大，最后组织方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强迫受训者不得离席，以给“理论

① 本研究因表达的习惯，有时也用教育研究来置换教育学研究，此时的教育研究则是指教育学研究，或者准确地说是专门从事教育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

家”面子。^①

一位决策者的看法：

“几年前，我偶尔碰巧与德国前教育部部长同坐一班飞机。他的专业是采矿工程学。他曾是一所大的技术学院的教授。他对教育研究感到非常失望，并大胆地发表了他对教育研究的疑虑。他当教育部部长时，把所有钱都用来为研究开辟通道，但‘实际上一无所获，什么结果也没有’。在像他这样的人中，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虽然他们没有这么明确地表达出来。”^②

一位研究者的感触：

在一个学术沙龙上，很多不同学科的朋友初次相识，彼此介绍各自的专业，当我报出“教育学”这个专业时，人们活跃的表情立刻变得木然，接着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沉默，他们的沉默有充分的背景和理由，但就是这些理由令我寝食不安，不由得替“教育学”生出些悲哀来。紧接着，作者列举了教育学的四个“悲哀”。第一，“对人类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大多数并不是教育学专业出身”。第二，“在师范院校所有的公共课中，教育学早已被学生普遍视为最枯燥乏味

① 史峰：《“纯理论家”的报告少出现为好》，载《上海教育》2007年第3期。教师培训是教育学研究服务于教育实践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彰显教育学研究价值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有些教师培训却不具有“培训”的特征，无视培训教师的认识基础、价值取向与现实需求，把培训演绎成千篇一律的教育知识传授，更令人质疑的是培训者一边倡导师生民主、平等，一边却把自己凌驾于培训教师之上；一边提倡启发式教学，一边却把各种“理念”不断翻飞，“你未唱罢他登场”。倘若“纯理论家”的报告不受人欢迎，我看，既有报告者不看对象之误，也有教育学研究长于理念、短于实践之嫌。

② [瑞典] 胡森：《教育研究的国际背景》，载瞿葆奎主编的《教育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在胡森看来，教育决策者与教育学研究者在研究问题的选择、时间观上存在着差异，导致相互抱怨也属正常。不过，教育越发展，其地位、作用越突出，越是伴随着更为复杂的管理和决策问题，这样，教育决策者需要教育学研究为其提供更多、更准确可靠的教育知识，同时，关注、研究重大的教育实践问题，服务于教育决策，也是教育学研究体现自身社会价值的途径。因此，就教育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来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构起教育学研究与教育决策、教育变革良性互动的机制。

的课程”。第三，“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教育学遭到其他学科普遍的漠视”、“具有中国学术权威象征的《中国社会科学》，难得一见有教育学方面的论文”、“教育学者尚不具备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谈论教育的资格”。第四，“现实告诉我们，书本上的教育学与实际生活中的教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优秀教师）并不是由于学了教育学，才懂得如何去教育学生的”。实际上，教育学成为一种“独白”，是一门自言自语、自我享受的学科，它试图告诉听众有关教育的真理，但听众并不需要它。考试和写论文时除外。^①

一位外国友人的看法：

作为一个连续阅读中国教育期刊长达 20 年的外国人，曹诗弟认为，关于中国教育的各种论文能否让阅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或者说，这类论文又能向大家揭示什么关于中国社会未来状况的真知灼见呢？坦率地讲，很少有论文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多数论文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作者根据一些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政策文献得出的主观意见，最后的结论往往在意料之中，不外是告诉你中国教育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②。

一位学者的反思：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随着西方一些‘经典’与‘新经典’教育论著以及作为教育思想之支撑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

① 李政涛：《教育学的悲哀与尊严》，载《方法》1999 年第 3 期。作者是一位热爱教育学、学识渊博的青年才俊，是 2005 年度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他不仅直陈教育学研究所存在的弊端，而且苦苦探询走出教育学研究的困境之可能。他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大实话。至于教育学课堂是否枯燥乏味，与教育学研究自身关联恐怕不大，况且，教学是一门艺术，即使有满肚子的“墨水”，也不一定能描绘出精彩的课堂教学来。

② 曹诗弟（Stig Thøgersen）：《中国教育研究重要吗》，载丁钢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序。“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教育理论研究不可谓不关注教育实践，但我们是否理论探讨得多了些，实证分析少了些；是否看似正确的结论多了些，可操作性的对策少了些；是否泛泛议论多了些，深入的见解少了些。



一些‘经典’与‘新经典’学术论著越来越多地被介绍与翻译进来，国内教育学界尤其是在一些青年学人中出现了对于这些论著的一种‘尊奉热’。在这种‘尊奉热’中，青年学人们似乎是若不频频引述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观念便不足以展开任何问题；在自己的论著结尾不开列一长串西方参考文献目录便不足以表明论著本身的思想深度与学术蕴涵，以至于到了张口西方学者、闭口还是西方学者的地步，否则，便几乎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而细细地研读之后，这些学人的论著中除了对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观点的引用、转述或‘阐释’之外，确实也别无他物，他们充其量只是扮演了西方思想的消费者、西方学者的代言人的角色。”^①

一位学者的呐喊：

“当今中国，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恐怕都不会对教育研究的状况赞许有加。只要冲出‘机械辩证法’的束缚，不再拘泥于国人迄今惯用的那种千篇一律的‘一分为二、成绩为主’的评价套式，则即便说当今中国教育研究‘假大空’盛行、‘剪刀加糨糊’之作充斥、‘学术垃圾’成堆也并不为过。中国

① 吴康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从何而来——由教育学界“尊奉”西学话语的现象引发的思考》，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一文中，叶澜先生也曾指出：“教育学发展中的第二大世纪性问题即‘中外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解决。尤其在当今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界国际交流加快、加强的环境中，教育学界‘向外看’、‘从外取’、‘以外为准’的心态与学风还在盛行。如若教育学界自身不作改变，那么在新世纪，教育学发展的第二大问题，有可能上升为制约教育学术发展的大问题。”可以说，20世纪前期的数十年，与21世纪初期的今天，我想大致都可以将其归为外来文化奔涌的时代。如果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还拥有享誉世界的教育家，如陶行知、蔡元培、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还有一些与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教育理论，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与“教育独立”等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该为社会、为他人贡献些什么，这恐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的教育学研究其实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①有学者更是直白地把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些现象斥责为“学术腐败”，他描述道：“随着‘象牙之塔’神秘感的慢慢消失，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疯狂蔓延开来，并且愈演愈烈。其花样之繁多、手段之高明、胆气之豪壮，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有请人捉刀的，有借鸡生蛋的，有花钱买名的，甚至还有空手套白狼的……不一而足。总之，从课题立项、论著（文）撰写与出版，到学术评奖等各个环节，学术腐败简直无处不在，无孔不入。”^②

自然，以上有关教育学研究的评论大多是从个人的观察、感受与体验而发，难免有以偏概全、追求完美之嫌，或有“恨铁不成钢”之“爱”。但是，这些评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比如，个体功利追求的无限膨胀，践踏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研究“好大”、“好虚”的空洞言辞，让人毫无收获；研究特色匮乏，鲜有扛鼎之作；实践价值缺失，不能融入教育实践等。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社会浮躁、浮夸的盛行，学术规范、建制的阙如以及个体品质、素养的低劣等。这些主客观因素无不影响着教育学研究的质量，损害着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已引起人们的警觉与关注。不过，这里笔者无意深究下去，只是想搞明白，假如每位研究者都心系“教育学研究”，都珍视、呵护其价值，那么如何提升教育学研究的价值这一问题。

的确，对教育学研究的责备、抱怨，我们可以列举更多的事例，但是，要想解决教育学研究的价值危机，其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说出了多少事实、事件或多少不尽如人意乃至令人痛恨的不足与弊端，也不在于我们探出了多少导致教育学研究价值危机的社会根源，^③而在于透彻地把

① 吴康宁：《重塑中国教育研究者的精神》，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30日。

② 程方生：《教育学术腐败探源》，载《教育评论》2002年第1期。在商品经济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一切东西似乎都能够视为商品，按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公平交易，加之科研成果的计量管理、学术成果出版的商业化运作，上述情况的出现也在逻辑之中，但是，这种情况是否也与教育学研究对自身的价值认识不清楚，没有明确的价值立场、学术追求有牵连？

③ 历史上有多少教育家身处乱世、一生坎坷，比如中国的孔子、陶行知，外国的卢梭、裴斯泰洛齐等，不是照样为教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吗？